

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吕 苏

打倒“四人帮”，人民得解放，中小学语文教学也得到了解放。但是，语文教学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不能很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不能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其具体表现就是学生语文程度太低，影响对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学习，也影响对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其中原因很多，认识也很不一致。我认为，首要的问题，必须明确语文教学的特点和目的任务，因为它是语文教学的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它是语文教学的“总纲”。“纲”解决不好，“目”也就难以解决，就不能多快好省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本文准备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广大语文教师以及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们商榷。

二十九年的回顾

解放初期，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政府手中接收了大批学校，广大语文教师有一个从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转变到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为了把语文课改造成无产阶级的课程，党和政府一方面在语文教师中大力提倡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强教师的思想改造；一方面废除旧的语文教材，编写了新教材，增加了语文教材中马列主义教育的新内容。当时的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并列的两条教学目的：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目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了语文培养的目的。从条文看，并没有规定谁是第一、第二，但把政治教育写在第一条，意味着它占第一位，一般语文教师也是这样理解和贯彻执行的。现在来看，当时这样提，对保证语文学科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不少教师为了向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或脱离课文，架空说教，或望文生义，离题万里，甚至生拉硬扯地联系实际。这不独收不到多少政治教育的效果，也削弱了语文的培养，显然不能反映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一九五四年左右，教育部修改了教学大纲，对教学目的，改变了提法：第一条，语文培养，第二条，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这样提，仍没有解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而且把二者位置颠倒过来，意味着语文第一，政治第二。现在看来，这样提，对突出语文教学的特点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在这以后，闹了一阵汉语、文学分科，教学思想比较混乱，即使在语文培养方面，也产生了混乱，如汉语、文学知识，究竟传授多少？怎样传授？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对语文教学影响较大，一方面，许多教师开始摸索语文培养的规律，如小学低年级集中识字，就是那时搞起来的，成绩还是不小的；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教师探索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规律，这在主观上也是可贵的，并取得了若干可行的经验，但也产生了一些脱离语文教学特点的做法，因而在处理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

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如：不少学校以系统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为标准编写教材，划分单元，组织教学。结果如何呢？学生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语文一科教学是无法完成的，更不是读了几篇文章，就能达到目的的。另一方面，由于用这个标准编选教材、组织教学，所以教材中增加了一些政治性强但不适宜作语文教材的文章，大量削减了一些经过长期考验适宜作讲读教材的文章。从课堂教学的实践来看，由于教师把注意力集中在无产阶级政治教育方面，很少考虑如何根据语文培养的规律组织教学，有人甚至认为“进行政治教育不进行政治教育，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少教个词，少讲个句，没大关系”。这就抛弃了语文教学的特点，违背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这种影响，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在“四人帮”横行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语文教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一九六二年，教育部总结了十几年语文教学的经验教训，重新编写了教学大纲（草案），六三年正式公布。这个大纲鲜明地指出了语文课的性质是工具课，提出了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读写能力，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语文基础。在文字叙述中，借用传统的“文”、“道”术语，正确地阐明了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把语文教学导入了正确的轨道。从一九六二——一九六六年的教学实践来看，语文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尽管当时还有汉语、文学分科产生的影响没有肃清，尽管在认识上还有许多不一致（如当时在《文汇报》上对语文教学目的的讨论就有三种意见，一是以政治为主，二是以语文为主，三是政治、语文并重，意见没有统一），但大纲基本得到了贯彻，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现在来看，这个大纲对语文教学目的的提法也是有缺点的，后来“四人帮”欺骗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这个大纲的批判，就是抓住这个缺点并以此为缺口，否定了十七年的教育，为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的。“四人帮”极左的批判，我们必须抛弃，但对这个大纲的缺点，我们也要作实事求是的研究。

这个大纲阐述了政治教育和语文教育的关系，基本上是正确的，可行的，是符合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的。但是不把政治教育列入教学目的的正文，在当时确曾引起若干混乱，如有的教师说：“今后不要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了！”如果说语文教学没有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今天也仍然不能为广大教师所接受。所以，至少可以说，这个大纲在这个问题上模糊的。另一方面，语文教学中的政治教育，应该结合语文教育进行，它寓于语文教育之中，也就是说“文”“道”是统一的，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途径，但也不能说“讲清了语言文字，就自然地进行了政治教育”，这中间还有个教师的自觉问题和立场、观点、感情、方法问题。如果脱离语文教学的基本途径去追求思想政治教育，那将是缘木求鱼；反过来说，如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随语言文字的讲解、训练而能自然达到，也会削弱语文教学的思想性，甚至会向学生进行非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为了在中小学阶段让学生掌握语文工具，为将来从事各种工作打下语文基础，在教材中不可避免地要选入一定数量的经过时间考验的适宜作语文教材的古代作品和外国非无产阶级的作品，这部分文章并不是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写的，教师在讲课中，不论是指导学生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或扬弃其剥削阶级糟粕，也不论是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必须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达到。否则，向

学生进行的就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如对《岳阳楼记》一文，如果只讲清语言文字，学生对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当然会有所感染，但同时也可能接受其中属于封建士大夫的不健康的思想情趣，而这与共产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不强调教师的“自觉”，不强调教师的立场、观点、感情和方法，是不当的。

就是讲授完全是无产阶级政治内容的作品，也有个教师的自觉问题，有个学生情况问题，有个着重点或侧重点的问题。如讲授《纪念白求恩》，教师应通过语言文字的讲解和训练，使学生接受其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内容，促进学生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但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不同，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从政治教育来讲，教师还是应该有个着重点或侧重点的。

把政治教育列入教学目的是必要的，提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地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也是必要的，这和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也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认为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自觉地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就会违背语文课的特点，就一定要脱离语文教学的基本途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四人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这个大纲打成修正主义大纲，把在这个大纲指导下编写的一套教材污蔑为封资修大杂烩，这就完全否定了语文学科的性质。他们打着突出政治的幌子，一方面把他们的黑货塞进语文教材，把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篡改为资产阶级邦派的教育，一方面完全抹杀了语文培养的任务，严重削弱了语文基本训练，导致语文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取消了语文这门学科或变成了政治课的“附庸”，而学生在青少年时期不掌握语文这个基本的工具，也就是说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不能读，不会写或者说读写能力十分低下，也导致了整个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必须记取的。

回顾二十九年的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语文教学总是受一定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并为之制约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研究任务是，如何根据语文教学的特点，来为党的方针、政策、路线服务。如果我们掌握了语文学科的特点，即根据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使有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也能使教学少受损失，而不致偏得太远。这个研究任务的首要问题，便是根据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和党的教育方针制定明确的目的任务。

第二，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对语文教学的特点，经历了一个由不太明确到逐步明确的过程，对语文教学的目的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经验是丰富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重新制定明确的教学目的，把教学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对语文教学社会本质的试析

“四人帮”打着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突出政治的幌子，“冲击”中小学语文教学，给语文教学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实践教育了我们，他们的“革命”和“政治”云云，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而已，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怀疑的了。但是，语文教学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譬如说，它是不是社会上层建筑？它是不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随着基础

的变化而变化？这需要我们认真地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如果我们把语文教学完全视为上层建筑，认为它是基础的反映并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显然这不符合语文教学的实际，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把语文教学完全排斥在上层建筑之外，显然这也不符合语文教学的实际，因为语文教学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语文教学，它的社会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语文教学既有非上层建筑本质的一面，又有上层建筑本质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所谓非上层建筑的一面，就是说语文教学的内容，有不为特定的基础所反映并不为特定的基础服务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有没有阶级性的东西，这就是语文培养的内容。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不管是什么经济基础，也不管哪个阶级掌握了语文教学这个阵地，语文教学总要教青少年识字、说话、阅读、写作，也就是说教青少年掌握语言文字这个工具，并运用这个工具，把前人和今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经验接受下来，发展下去。自从奴隶制社会有了学校以来，一样的“天、地、木、石”，一样的组词成句，组句成章，组章成篇。掌握语言文字，具有阅读、写作能力并不因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它对任何基础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什么道理非把这些内容硬并入上层建筑不可呢？如果你把这些内容硬说成是上层建筑而加以惩罚，那么，受惩罚的到头来还是你这个基础。道理很简单，它并不是特定基础的产物，它对各种基础都可以“效劳”，你既然不让这个工具为你“效劳”，吃亏的当然还是你自己。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没有阶级性，它是既不属于基础又不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

从当前的斗争实际来看，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能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不独对学好各门功课有巨大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学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打好语文基础。世界上有几个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是错字连篇、文理不通呢？所以，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教育青少年一代多快好省地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打好语文基础，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对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如果象“四人帮”那样诬蔑语文培养为“单纯文化观点”，“白专道路”等等，弄得学生连祖宗遗留给我们的语言文字也不能掌握，一不能读，二不能写，他们凭什么去攀登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将如何实现？由此可见，我们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是什么？“四人帮”所突出的政治又是什么？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所以，中小学语文教学应该努力培养学生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为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而斗争。这种能力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不应随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它不应受各种斗争的干扰。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整体上来看，它只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也绝对地需要它。我们应该排除各种错误的认识，特别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散布的谬论，鲜明地举起工具课的旗帜，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工具课。

那么，所谓上层建筑本质的一面又是指的什么呢？语文教学为什么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总是那么密切联系呢？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过程来考查，所谓识字，不是念字典词典，所谓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读写能力，也不能脱离阅读一篇篇的文章，以及结合阅读进行写作练习。这就是说，学生识字、写字、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都是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这是语文教学的基本内容。尽管语言文字本身没有阶级性，读写能力本身也没有阶级性，但一旦运用它来表达一定的意义时，它总是和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相联系

。不管是作家创作或学生作文，总要表达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教师教一篇课文，从学生角度说，也就是阅读一篇课文，总要体会作者怎样从社会生活中选择题材，提炼主题，然后探讨从表达主题思想需要出发，如何剪裁，如何布局成篇，如何选词造句，这样表达了什么思想？表达得好不好？这种思想好不好？等等。因此，作者的思想时时影响学生，教师的思想也时时影响着学生。这样看语文教学怎么能离开意识形态的斗争呢？指导学生作文，同样是与一定的思想意识相联系的。正是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说语文教学有上层建筑本质的一面，而不能把语文教学完全排除在上层建筑之外。

历史的经验证明，不管哪个阶级掌握了语文教学的领导权，总要利用这个阵地来传播他们阶级的思想，为他们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从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是如此。这不独表现在教材的编选上，也表现在教师对教材的把握和传授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总是以五经四书为基本教材，既是语文教材，也是政治教材。随着时代的转移，阶级斗争的发展，对五经四书的注释也花样翻新，有几百种，但不管怎样解释，总是宣扬封建伦理那一套为封建主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东西。就是《诗经》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小小的恋歌，也被腐儒们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今天看来简直可笑，然而这种解释却被“钦定”为唯一合法的解释，这不恰好说明他们鲜明的阶级性吗？再如《伐檀》、《硕鼠》那一类的民歌，乍看起来，我们几乎很难说明剥削阶级竟能容忍这样的语文教材，其实他们完全能够解释得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这充分说明了语文教材有阶级性，教师如何解释和传授这些教材也有阶级性，因而我们说语文教学有社会上层建筑本质的一面，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如此，我们在坚持工具课的前提下，也要为提高语文教学的思想政治性而斗争，充分发挥上层建筑这侧一面本质的作用，根据语文课的特点，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把林彪、“四人帮”所“突出”的“政治”从语文教学领域中驱逐出去，自觉地积极地进行合乎语文教学规律的确有实效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并和学校政治工作在一起，为把我们青少年一代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发挥应有的作用。

语文培养和政治教育的统一

既是语文培养，又有政治教育，二者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关系，没有任何人怀疑，但这两方面，究竟谁是起主导作用的方面，谁决定语文课的性质？在认识上就众说纷纭了。我们研究问题，不应从定义或概念出发，而应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也就是要从语文教学的实际进程来考察。

先说语文教材的编选，这是首要的问题。

编选中小学语文教材，首先应该考虑的，即起主导作用的是语文培养，还是政治教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个问题是不太清醒的。应该感谢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给我们的教训太深刻了，痛定思痛，我们才比较清醒起来。林彪、“四人帮”在教育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是从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以及在这个大纲指导下编写的一整套教材开始的，让我们粗略地剖析一下吧。

小学低年级识字教材是广大教师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逐步摸索、创造、

完善起来的。这套教材是根据汉字的特点，充分发挥拼音字母的工具作用，根据从看图识字到阅读短文，从偏旁部首即独体字到合体字，从单字的基本意义到多种意义，从能认会读逐步达到会写会用，从分散到集中，从集中到分散，集中、分散相结合等客观规律创造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教学体系。在六二年至六六年那段时间内，许多教师按照那个教材体系进行教学，在两年时间内，能教会学生初步认识二千多个常用汉字，为以后的阅读、写作、识字，也为学好其他学科打下了基础。这完全符合儿童学习汉字的规律，也符合全面提高各科教学质量的规律。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们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尚低，生活经验尚少，根据这些特点，教他们集中力量迅速地掌握两千多个常用汉字，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也为今后获得直接的间接的生活经验从而提高政治觉悟打好基础，这有什么不好？这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多出人才，快出人材是有战略意义的。然而，林彪、“四人帮”却诬蔑这一教材是“人性论”、“脱离政治”等等，全盘否定。于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变成了毛主席语录课。乍看起来，这是“突出政治”，似乎很“革命”，实际情况如何呢？七、八岁的孩子要理解马列主义的一些最基本的原理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四人帮”的“帽子”和“棍子”满天飞，许多教师唯恐解释不准确被抓住“辫子”，于是只好读呀读呀，结果学生食而不知其味，形成了死记硬背，严重挫伤了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这样的教材完全不按识字的规律编选，孩子们只好孤立地学一个一个的汉字，又不太懂，练的又少，结果识字率严重下降，直到高中毕业，还不能掌握二、三千个常用汉字，有的竟接近于文盲，完全成了废品。“四人帮”一伙蠢驴，根本不懂教育，连封建社会的冬烘先生也不如。冬烘先生们在教学生读五经四书之前，还知道先教启蒙课本，如“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识字教材。道理很简单，学生如不先初步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怎么能进行阅读？怎么能进入写作？

所以，小学低年级语文教材，必须突出识字教学，必须按照儿童识字的规律编选教材，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在这个前提下，教材的思想性尽可能强些，但是绝不应该违背识字教学的规律去追求什么政治性、思想性。历史的结论恐怕只能这样作出。

从小学中年级一直到高中，语文教材的主要内容是讲读教材（也可叫阅读教材）。这是一篇篇的文章，是供教师讲的，也是供学生读的。教师的讲，是为了指导学生读懂、读好、读熟，让学生在读的实践中，逐步获得阅读能力，并从中积累语言，学习写作经验，为写作奠定基础。这中间，识字的任务是一直跟到底的，不过年级越高，由于学生逐步获得了独立识字的能力而任务相对地减轻罢了。根据六二年大纲编写的那套教材，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要求，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兼顾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要求而编选的。而“四人帮”打着“突出政治”的幌子诬蔑这套教材是封、资、修的大杂烩，全盘否定。事实是怎样的呢？且不说适宜做讲读教材的马、列、毛主席著作，鲁迅著作占教材总篇数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就是被他们指责为修正主义的作品，也大抵是被他们迫害的无产阶级作家的经过考验适宜作讲读教材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分马》，夏衍的《包身工》等等。而被他们指责为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作品，大抵是经过长时期考验适宜作讲读教材的、优秀的有进步意义的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为了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更好地理解 and 掌握现代汉语，为了培养学生批判地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理解并初步掌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些教材对中、小学生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他们否定这套教材，另来一套，又是什么内容呢？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增多了，政治性看来是增

强了；实际上不少篇目或篇幅过长，或内容艰深，并不适宜作讲读教材，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有些篇目是根据他们反革命政治需要而编入的，他们以卑劣的伎俩肆意歪曲这些经典著作，使语文教学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服务。另外，他们又把按照“主题先行”“创作”方法粗制滥造的一批论文、小说、剧本、散文、新闻报导、调查报告等塞入教材，这完全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们突出的“政治”，大抵如此！这一批粗制滥造的文章，帮风严重，给青少年以恶劣影响。从文字看，或语言晦涩，或又臭又长，根本不适宜做语文教材，曾几何时，就被广大师生抛弃了。后来他们也选几篇文言文作点缀，这也是为他们的“帮派史学”、“儒法斗争”谬论服务的。特别是他们实用主义猖獗，强调“紧跟”形势，几乎每年都要变更一次教材。有些问题今年还是对的，好的，明年就是错的、坏的，就要进行批判，弄得教师无法教，学生不能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教训实在深刻。

所以，中小学讲读教材的编选必须严格按照语文培养的要求，既要符合识字的规律（这在小学阶段特别重要，常用字要反复出现，多次出现。因为对字音、字形、字义的掌握是不可能一、二次出现就能牢固掌握的），又要符合阅读和写作能力逐步提高的规律（这在中学阶段特别重要。这个问题很复杂，绝不是随手拣来一篇文章，随意编入某册就可以办到的）。在选择篇目和具体安排时，一定要注意以下问题：

1. 要注意文章的典范性，适宜做讲读教材，一般说来，这些文章在立意、布局谋篇、用词造句方面，可以作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能给学生一定的启示。语言一定要通顺流畅，符合汉语规范化，便于学生反复诵读，以达到熟读或背诵，通过熟读背诵，能积累一定的语言材料。

2. 篇幅一般要短小精悍，不要过长，适宜于课堂讲读。

3. 根据各年级的特点和具体要求，按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编排教材。对阅读和写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应有适当的循环和反复。

4. 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文言文，有少量外国作品，也要有少量的科学论文，科学小品，或介绍科技的说明文。对译文和科技论说文，在文字上，要从严要求，适宜作讲读教材。

5. 教材要相对稳定，要在若干年内基本不变，以利于教师熟练地把握教材，积累教学经验（也可以稍留一定机动时间，让各地、各校根据形势、任务自选教材）。

在保证语文培养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教材的思想性、政治性。由于好文章有极大的选择余地，这绝不会削弱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至于说有了一批文言文和外国古典作品，那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教师要教学生如何批判继承，这难道不是马列主义教育吗？不接触古代作品，如何能学会批判继承？何况我们所选的应该是古代优秀的有进步意义的文化遗产！有些好心的同志，心胸和眼界总是那样的狭窄，总是不相信广大语文教师和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总是意识不到他们有极高的识别能力，总是杞人忧天。上文说过，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在他们的语文教材中，也容许一点《硕鼠》、《伐檀》那样咒骂他们阶级的诗歌，我们为了培养学生全面地掌握语文工具，就害怕那一点封建性糟粕吗？而且糟粕还和精华混合在一起呢！语文教学的思想性如何？首先决定于教材，但最后还要决定于教师的讲解和传授，教师的阶级属性如何，才是最后决定的东西。同是一篇教材，可以有不同的思想效果，所谓戏法一样，变化各有不同。如果说这样会削弱语文教学的思想性政治性，那么“削弱”的也只能是脱离语文特点并无实效的思想性，还有林彪、“四人帮”强加给语

文课的那种害党害国误人子弟的思想性，这种“削弱”好得很！有“削弱”才有“增强”，增强的是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有较高的语文水平，从而掌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真实本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

所以，一般说来，在编选语文教材时，语文培养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它决定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它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本质。当然，不同的社会，在思想教育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当着社会性质起了变化的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则转化到思想内容方面去。如建国初我们就废除了国民党的教材，在这时，思想内容则是决定性的东西。然而，它决定的只是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语文课，即使在这时，也不应超越语文课这个界限。建国二十九年来，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语文课的政治方向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语文教师队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党的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方面来，在这时，能否编出适宜于语文培养的语文教材，能否真正教成语文课，已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有个清醒的认识。

从语文教学的实际过程来考察，语文培养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主导作用的方面。道理很简单，要想使学生理解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受到教育，必须理解语言文字，并且必须从理解语言文字起。正确的语文教学的方法，总是要指导学生一字字、一句句、一层层、一段段地从局部到整体地理解全文的内容，通常的公式总是这个字，这个词怎样讲，在这里表现了什么内容，这一句怎样讲，作者这样说表现了什么思想，这一层、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作者这样安排有什么意图，即表现了什么思想。当然，各种不同的文体，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学生要真正读懂任何一篇文章，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和特点，总不能离开这个基本的途径。此外还有什么好方法能使学生读懂文章呢？可以说是没有了。不是有的教师同志不通过语言文字在那里大讲思想内容，并且据说思想教育效果还很好吗？如果说这样进行语文教学，可能有一定的思想教育效果，我是相信的；如果说效果很好，我就不敢相信。如果说真的效果很好，那么，还要个语文教材干什么？你想向学生进行什么教育，那就列个提纲或编个故事向学生讲解就可以了，语文教材不是个“累赘”了吗？如果不根据教材，把语言文字讲清楚，并进行一定的语文训练，即使思想教育很好，还算不算语文课呢？事实上，因为你上的是语文课，有个课文在那里“扯腿”，使你无法无所拘束地进行政治教育，只好架空说教或抓住一点，无限发挥，这样的思想教育，如果说也有效果，那也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可能使学生厌烦，适得其反。这样的苦头，我们还没有吃够吗？

所以，从讲解课文的实际过程来考查，讲清语言文字，实施语文基本训练，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它决定语文课的本质，不讲清语言文字，学生就无法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也就无法接受政治教育。这样说，有的同志可能说：“那么，内容决定形式，又如何理解呢？”

我们研究创作的规律，我们研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般来说，内容是决定形式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才应该指导学生从理解语言文字起，学生能否正确地理解语言文字，决定能否真正理解课文的内容。任何一个作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阶级一边，从现实生活出发，想表达一个主张或表现一种思想，才写文章。为了阐述这种主张或思想，决定选择什么材料，如何布局谋篇，如何选词造句等等，这叫做内容决定形式。教师讲解一篇文章，正是揭开作者创作这篇文章的“秘密”，即揭开作者立意、布局谋篇、用词造句的意图，从而理解这篇文章的内容，学习作品的语言技巧。要达此目的，必须理解

语言文字，从理解形式的诸要素开始。在中小学，在形式的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字、词、句、篇，如不理解字、词、句、篇，其他要素，也无法真正理解。所以，研究创作规律，研究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一般可以说，内容决定形式。但是，研究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规律，则是理解形式决定理解内容。在形式诸要素中，关键的东西，是字、词、句、篇。学生能否理解字、词、句、篇，不独决定学生能否理解内容，也决定对形式中其他要素的理解。我们不应该把创作的规律和语文教学的规律等同起来或混淆起来。

那么，指导学生作文又是什么情况呢？学生作文和作家创作，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所谓相同，是指作文本身而言，如上所述，当然是内容决定形式。所以，我们应该指导学生为革命而作文，从生活出发，宣传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思想，逐步学会从现实生活中选择材料，提炼主题，然后根据表达主题思想的需要，布局谋篇，用词造句。所谓不同，是指作文教学而言，或者说就是就指导学生作文而言。作文是语文训练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整个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首先要考虑的，即起主导作用的东西，还应该是语文培养。不管从整个学段（小学、初中或高中）、学年、学期考虑，还是从一次具体的作文训练考虑，都应该首先考虑语文培养的具体要求，譬如说是写什么样的记叙文、论说文、应用文？根据这种要求，学生的实际写作能力如何？生活经验、材料来源如何？从生活中选材组材的能力如何？如何命题？如何具体指导等等。当然，教师也应该考虑如何配合现实斗争，如何通过作文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但是，这种考虑必须建立在语文培养的基础上，并和语文培养的任务密切结合起来。所以指导学生作文，从整体上来看，起主导作用的东西，还应是语文培养的任务。因此，对小学阶段、中学阶段、一个学年、一个学期以至一次具体作文训练，在写作能力上，都应有具体的要求，并且按照写作能力发展的规律，安排训练，实施训练，这绝不是脑子一热，想作个什么就作个什么所能凑效的。

所以，从整个语文教学的实施过程来看，语文培养总是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它决定语文教学的性质。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在教学过程的某些具体环节和步骤中，思想政治教育也可能是起主导作用的决定性的东西。譬如说，在讲读教学中，也会出现学生不理解某些政治常识因而不理解语文形式的情况，如讲解短小的抒情诗，学生不理解产生作品的政治背景和作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就不易理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在作文教学中，也会发现学生有政治观点的错误，或政治观点不明确，因而在立意布局谋篇用词造句上产生缺点和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正确地讲解某些政治常识，阐明某种政治观点，也是绝对需要的，不如此，便无法讲清语言文字中的若干问题。在这时，政治教育则暂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这只是暂时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种情况只是少量的、局部的，并不是大量的，经常的。而且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教师的讲解也是为了进行语文教学，只能作适当的讲解，而不应象政治教师或历史教师那样，原原本本地作系统深入的讲解，否则，就会喧宾夺主，丧失语文课的特点，削弱语文教学的效果。

如何规定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可大致作如下条文规定，或根据这种精神，作出明确的文字规定：

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掌握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为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打好语文基础，并在实现上述目的过程中，自觉地向学生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

我认为，如果这样规定，有助于总结二十九年来主要的经验，克服过去所发生过的主要错误倾向，因为它解决了如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它突出了语文课是工具课的特点，有利于克服过去脱离语文教学特点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有助于把语文课上成真正的语文课，使学生多快好省地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具备实际的读写能力。这不独在普通教育中，能为学好各门学科，提高教育质量创造有利条件，而且能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多出人材，快出人材，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应尽的力量。

第二、在突出工具课特点的前提下，把无产阶级政治教育的目的，明确写进条文规定，并强调了教师的自觉性，这有助于语文教材编选者和广大教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把语文课上成社会主义的语文课，防止忽视政治的错误倾向。

第三、它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语文培养和政治教育的关系，因为它规定了政治教育应在语文培养的过程中进行，明确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政治教育的特点，体现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可以克服和防止脱离语文培养随意塞入政治教育内容侵占课时并无实效的各种错误做法。

当然，根据这个规定，在语文培养方面，各学段，各学年应制定具体的任务和要求。在政治教育方面，可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宣传教育要点，作为教育内容的着重点。如果党确有特定的紧迫的中心任务，可在机动时间内临时编选部分教材，以配合党的中心任务。

以上意见，难免有不当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上接25页）

方法管理文学艺术，以“长官意志”论定作品好坏，以“三段论”式的推理代替艺术鉴赏，以逻辑思维取消形象思维，把有血有肉的人物化成简单化、概念化的公式，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研究方面制造清规戒律，设置禁区，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坚持彻底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表现，都是不利于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的。粉碎了“四人帮”，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们有条件坚持彻底的唯物论、辩证法，彻底除掉一切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之类做法，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艺术民主，保证文学艺术事业中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提倡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和观点自由争论，艺术的春风，科学的春风，必将又绿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①③⑦⑩《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409，308，210页。

②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页。以下凡引本书仅在正文中注明页码。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7页，第二卷第121页。

⑥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7，128页。

⑧参见汝信《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载《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

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册第27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06，450页。